

中国教育史话

秦国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秦国强 著

中国教育史话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史话/秦国强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9-10546-9

I. 中… II. 秦… III. 教育史-中国-幼儿师范学校-教材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9893 号

中国教育史话

秦国强 著

责任编辑/张 炼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2 字数 313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46-9/G · 1322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秦国强，重庆市人，生于1947年5月1日，1966年7月毕业于重庆市第二师范学校，1980年3月任重庆市交通局团委书记，1985年8月任重庆交通技校校长，1994年3月任重庆成渝高速公路管理处处长，2000年1月任重庆成渝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及董事长，2007年6月退休。著有《中国交通史话》。

前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绝的古老文明，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教育是传播文化的艺术，是培养人的学问。人类正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将一代又一代新人引入优秀的文化领域，使精神文明不断发扬光大，使物质文明得以持续发展。中国教育发源于原始社会的涓涓细流，散见于历代古籍的汪洋大海，是炎黄子孙世代辛勤劳动的成果。努力将这些瑰宝从古人的窖藏中运载出来，使每一节车厢都琳琅满目，这就是我奋力写作这本书的目的。

教育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活动，是人类走出蒙昧，走向进步，通往未来的桥梁。《中国教育辞典》为教育所下的定义是：

“教育为改进人类生活之活动历程；目的在培养健全的个人而创造进展的社会；其方法在利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刺激，使受教育者活动感染于其中而创造新生活。”^[1]

这正如钱穆大师所言：“严格言之，可谓中国自古无宗教。佛教传入，其事在后。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所占之地位及其责任，乃特别重大。”^[2]中国教育的发展既源远流长，也艰难曲折。历史资源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百般珍视，更需要积极开发，诚如孔夫子所言：“温故而知新，

[1] 王岗《中国教育辞典》（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643页。

[2]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1页。



可以为师矣。”^[1]

据《说文解字》解释,所谓“教”,就是“上所施下所效也”^[2];所谓“育”,就是“养子使作善也”^[3]。“育”字从“云”、从“肉”,“云”字由“二”和“厶”组成,“二”的古意是“复制”,“厶”是“私”的古字,意思就是复制肉体,也就是“生育”,后来又引申为“养育”、“培育”。中国古籍率先合称“教育”二字者,是孟子所谓:“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以德服天下并不在其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无灾祸),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zuò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4]

关于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中庸》的说法是:“天命之谓性(人的天赋称为天性),率性之谓道(遵循天性而为就是道),修道之谓教(按照道的原则修明推广于人就是教育)”^[5];《荀子》的说法是:“性者,本始材朴也(天性是原始的自然材质);伪(人为)者,文理隆盛也(通过人为努力可以使文明礼仪发扬光大)。无性(如果没有天生的材质),则伪之无所加(人为努力就没有施展的基础);无伪(没有人为努力),则性不能自美(天性不能自己趋于完美)。性伪合(天性与人为努力相结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就可以造就名副其实的圣人),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人类社会也就因此获得发展进步)”^[6]。

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中,既留有开创人类教育先河的诸多成果,也留有制度文明滞后的诸多遗憾。抚今思昔,回首品味先贤的睿智,从原始社会的石斧、石镞中,从诸子百家的哲言中,从私塾、书院、社学、国学的诵读声中,我们既能感受教育的艰辛,也能分享奋进的光荣,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也有助于展望未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马克思所向往的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完全发展、自由发展为本原则的社会。”^[7]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这应当是我们今天学习教育学、理解教育史的出发点。

历史是一面包容万象的镜子,可以整衣冠,可以知兴替,可以鉴得失。深入探寻中国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既可以跨越时空回首沧桑,也可以穿透星云展望未来,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给人以鼓舞,因此特别值得回味,值得思索,值得彰显。本书从历代史料中采撷大量果实编织为若干专题,但愿能以此展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风貌,有助于认识教育的过去,审视教育的现状,探索教育的未来。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3] 同上书第1291页。

[4] 万丽华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7页。

[5] 王国轩译注《中庸》(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页。

[6] 蒋南华《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7] 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卷第430页。

[8]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1031页。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迷雾中的花絮

1. 巫山人的生活教育	001
2. 史前的技能教育	002
3. 史前的艺术教育	002
4. 史前的宗教教育	003
5. 陶文与教育	003
6. 最古老的教育培养目标	004
7. 成均之学	005
8. 学校的雏形——庠	006

第二章 文明的曙光

1. 夏代的“序”与“校”	008
2. 夏代的“六府三事”与“九歌”	009
3. 商代的“以乐造士”	009
4. 傅说的“教学半”	010
5. 西周的“孺子室”	011
6. 西周的国学	012
7. 西周的乡学与教师	014
8. 西周的“六艺”	014
9. 西周的学业考察	017
10. 西周的视学与贡士	018



第三章 变革中的私学勃兴

1. 士与私学	020
2. 畴官与家庭教育	022
3. 孔子的人格教育	023
4. 墨子与墨学	026
5. 孟子的道德教育	028
6. 孟母的家教	031
7. 荀子的教育目标	033
8. 稷下学宫	035
9. 法家的“壹教”	037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整合

1. 秦代的“书同文”与“吏学”	040
2. 秦代的“行同伦”与“以法为教”	041
3.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042
4. 汉初教育的复苏	043
5. 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044
6. 汉代的太学	045
7. 文翁石室	048
8. 汉代的地方官学	050
9. 汉代私学趣闻	051
10. 学潮与“党锢之祸”	053
11. 郑玄与汉代经学	055
12. 鸿都门学	058
13. 班昭与女教师	059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的多元化教育

1. 曹操的人才教育观	062
2. 曹丕与“五经课试之法”	063
3. 魏晋南北朝的宫廷教育	064
4. “九品官人法”与“国子学”	067
5. 魏晋南北朝的专科教育	069
6. 魏晋南北朝的私学	071
7. 北魏的汉化教育	073
8.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074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儒学振兴

1. 从国子寺到国子监	078
2. 科举考试的发端	079
3. 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081
4. 唐代的武举考试	085
5. 唐代国子监的直属学校	086
6. 唐代中央各部门的官学	087
7. 唐代的地方官学	090
8. 唐代官学的管理制度	091
9. 唐代官学教师的待遇	093
10. 唐代的私学	095
11. 唐代的新儒学	099
12. 日本遣唐使与留学生	099

第七章 宋代与辽金夏元的教育

1. 宋代的科举考试	103
2. 宋代的武举	106
3. 中国古代第一所军校	108
4. 庆历新政与学田制度	110
5. 宋代四大书院	111
6. 辽国的教育	115
7. 金国的教育	116
8. 西夏的教育与状元皇帝	118
9. 元代的学校与科举	120

第八章 明代的教育

1. 明代的中央官学	123
2. 明代的地方儒学	126
3. 明代的小学	127
4. 明代的宗学	128
5. 明代的专科教育	128
6. 明代的科举与八股文	130
7. 东林书院	134
8. 明代的武举	137



第九章 清代的教育

1. 清代的文武之道	140
2. 清代的国子监	141
3. 清代的琉球学	143
4. 清代的八旗学校	145
5. 清代的地方官学	147
6. 清代的蒙学	151
7. 清初书院的名师	153
8. 清代状元趣闻	156
9. 清代科场丑闻	158

第十章 近代新学

1. 近代教育思想的先驱	162
2. 近代教会大学	164
3. 京师同文馆	166
4. 福建船政学堂	168
5. 张之洞与近代新学	169
6. 北洋大学堂	171
7. 南洋公学	173
8. 万木草堂与戊戌变法	174
9. 京师大学堂	177
10. 震旦学院与复旦公学	180
11. 庚子赔款与游美肄业馆	181

后记

第一章

迷雾中的花絮

据目前考古发现,早在200万年前,中华大地就已有古人类聚居。尽管悠久的历史不免迷雾重重,但透过迷雾去探究人类的童年,我们仍能依稀辨识当年繁花盛开的原野,采撷到生生不息的教育花絮。

1. 巫山人的生活教育

1985年10月13日,中科院黄万波研究员在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发现史前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1]。经测定,确认巫山人是204万年前的直立人,这个化石也是亚欧大陆目前所见最早的古人类化石。2003年,中国与法国学者发掘出龙骨坡遗址的大量石制工具,勾画出巫山人的社会生活场景。专家们发现,巫山人制作的石器分别出土于180万年前至200万年前的不同地层,时间跨度达20万年,但制作工艺却始终绵延相承,这表明巫山人不仅创造了“巫山文化”,而且开创了“巫山教育”。正如孙培青先生所言:



巫山龙骨坡遗址

“这种原始的教育活动,已经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但还谈不上有严密的计划性。原始人群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2]

[1] 黄万波《寻踪揭秘》(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2]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 史前的技能教育

大约10余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 中国古人逐渐从原始人群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韩非子》记载:“**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 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luǒ, 古人以木实为果, 草实为蓏)蚌蛤(bàng gé), 腥臊(sāo)恶臭而伤害肠胃, 民多疾病。有圣人作, 钻燧取火, 以化腥臊, 而民说(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燧人氏’。”^[1]韩非所说的有巢氏和燧人氏, 都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杰出人物。中国古籍将燧人氏列为“三皇”之首, 与发明八卦(文字雏形)的伏羲氏、首创农耕文明的神农氏, 并称炎黄之前的中华文明始祖。《尸子》记载:“燧人之世, 天下多水, 故**教民以渔**。虑牺(伏羲)氏之世, 天下多兽, 故**教民以猎**”^[2];《易经》记载:“神农氏作, 斲(zhuó, 砍削)木为耜(sì, 木锄), 揉木为耒(lěi, 木犁), 耒耨(nòu)之利, **以教天下**。”^[3]由此可见, 无论是燧人氏教人取火、捕鱼, 还是伏羲氏教人打猎, 神农氏教人使用农具, 都是人类顺应自然环境的重大社会变革, 其实现途径都离不开一个“教”字, 这就是史前人类的技能教育。

3. 史前的艺术教育

艺术发源于劳动与生活, 是人类进化到具有审美思维能力的产物。史前艺术是表现原始人类思想感情的意识形态, 也是原始文化的结晶。1933年11月2日, 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发现山顶洞人头骨化石, 经测定是1.8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在山顶洞人的遗物中, 有141件钻孔的装饰品, “是头部、颈部等处的饰物”^[4]。正如德国著名艺术家格罗塞所言:“形象艺术最原始的形式, 恐怕不是独立的雕刻而是装

饰, 而装饰的最初应用, 却是在人体上”^[5], 可见山顶洞人制作的装饰品, 也就是中国史前人类最初的艺术品。1980年, 考古学家在河南贾湖文化遗址发掘出18支骨笛。经专家研究, 这批骨笛是大约7600年前中国古人的遗物, 其中有一支七孔骨笛已具备七音音阶, 可以吹奏旋律, “将我国乃至世界音阶形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6]在此前后,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地, 也相继发现大约6000年前的石磬、陶钟、木鼓、骨哨、陶哨、陶号、陶埙(xūn), 这表明原始社会末期的中国先民, 已经广泛开展音乐艺术活动及音乐艺术教育。



七孔骨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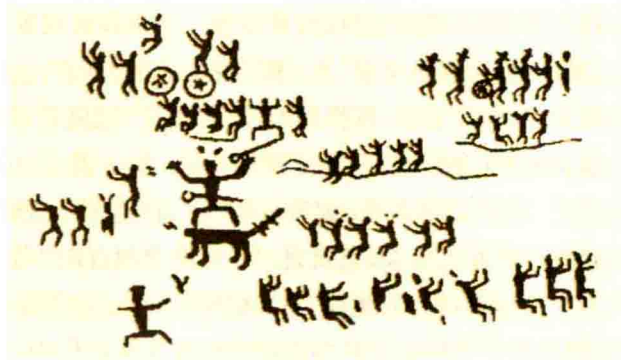
据专家研究, 原始艺术发端于巫术。汉语“神”

[1] 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7页。
[2] 李守奎《尸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3] 郭彧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0页。
[4]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5]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0页。
[6] 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138页。

字的原型是雷电(甲骨文的“申”和“电”是同一字)。与神字相关的“靈(灵)”字,就是巫师设置供品求雨,可见中国古人的巫术是对自然现象的祈望,是有意识的文化活动。由于古代生产力十分薄弱,经常需要祈求大自然的恩赐,于是就有大量的祭祀活动。为体现这种祭祀活动的庄严,原始音乐、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也就很快得到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无论是河姆渡文化中的陶雕禾苗纹、鱼纹、蔬菜纹,仰韶文化中的太阳纹、鹿纹、人面鱼纹、鱼蛙纹、彩绘石斧图、陶塑鸟、陶塑房屋模型,红山文化中的玉雕鸟、玉雕龟,大汶口文化中的陶雕谷粒纹、陶塑龟、陶塑猪、陶塑石斧图、陶塑石铎图,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塑石斧,薛家岗文化中的陶塑牛首,龙山文化的石雕猪、玉雕虎,石家河文化的陶塑、玉雕,都堪称中国史前艺术的代表作。据专家研究,“在原始的美术创作中,除了进行美术本身的知识与技巧外,有时还必须掌握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这就大大丰富了原始社会教育的内容”^[1]。

4. 史前的宗教教育

中国史前人类的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祀,正是这种祭祀活动最终形成影响中国历史达3千多年的礼教。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大量卜骨。“这种卜骨均由个体较大的动物,如牛、鹿、猪、羊等肩胛骨做成,一般不加修治。占卜时在背面用火烧灼,烧成直径约半厘米的焦黑癍痕或灼号,正面也出现颜色较浅的灼号。”^[2]巫师通过解释这些灼号,以达到假传天意的目的,这就是原始氏族社会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占卜。主持占卜的巫师,是一种半人半神的特殊人物,他们既有原始宗教的知识,也通晓历史及医药等知识,是史前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原型。巫师需要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受到训练,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有实行巫术的特殊技能”^[3],巫术活动本身也“起着一种社会教育的作用”^[4]。



巫术与原始宗教

5. 陶文与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5],“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6]这就是说,语言既是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与劳动一起推进社会的动力。可见人类语言发展史与人类劳动发展史一样,已经走过漫长的360万年历程,

[1] 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第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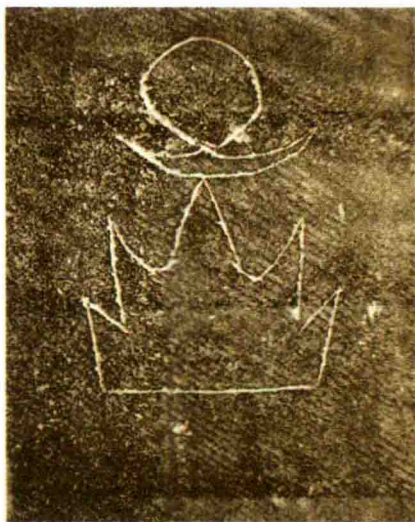
[2]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卷第340页。

[3] 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第39页。

[4] 同上。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6] 同上书第299页。



陶文“旦”字

但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文字,却只有不足1万年的历史。据恩格斯所言,人类历史“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可见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识。目前考古发现最古老的文字是陶文。所谓“陶文”,就是中国古人刻画在陶器上的信息符号。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认为:“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jié)遗。”^[2]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曾把半坡陶器上的个别刻画符号与汉字作对比,认为这种陶文就是我国汉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3]。就目前考古发掘所知,已有3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陶文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陶文刻画符号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它们约属8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4]。这个纪录比古埃及人6000年前的图画文字、古巴比伦人5500年前的楔形文字更为

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符号。

文字的萌生和日益广泛的运用,促进了文化知识的积累,同时也为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据《帝王世纪》所记,黄帝统一中华各民族部落之后,“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记其言动,策而藏之,名曰书契”^[5]。据《说文解字》所言,仓颉“见鸟兽蹄迹(háng,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文”^[6]。这就是说,仓颉已经将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的陶文融为一体,创立了象形文字,用于撰写史书,使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文明时代。仓颉原姓侯冈名颉,是黄帝的史官,由于功勋卓著,被黄帝赐姓“倉(仓)”,意思就是功在君王之上的伟人。《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7]可见仓颉首创“鸟迹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件大事。正如孙培青先生所言:“文字的产生,文字教学的需要,不仅对学校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后来文化科学及社会发展也有重大促进作用。”^[8]

6. 最古老的教育培养目标

据《史记》记载,舜帝与大禹、伯益、皋陶讨论政治时,皋陶就曾明确提出9条用人标准:

“宽而栗(宽厚而又严密),柔而立(柔和而有决断),愿而恭(诚恳而又恭敬),治而敬(安稳而又谨慎),扰而毅(顺从而又坚毅),直而温(正直而又温和),简而廉(简约而又廉洁),刚而实(果断而又讲求实效),强而义(好强而又讲道理)”^[9]称之为“九德”。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2]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页)。

[3] 王玉哲《中国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4] 郑若葵《解字说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5] 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页。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44页。

[7] 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8]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9页。

[9]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7页。

这既是中国古人评价人才的基本标准,显然也是中国古籍记录最早的教育培养目标。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出现,中国教育也开始进入全新的时代。据《史记》所言,夏王朝的创立者夏禹“名曰文命”^[1],按照孔安国的解释,就是“外布文德教命”^[2]。《礼记》有所谓“夏道遵命”^[3],意思是“夏之为政之道尊重四时政教之命,使人劝事乐功也”^[4],可见夏代的教育已经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是宣扬政教的重要渠道,其特点就是重视传播四时季节变化的知识,引导社会生产活动,鼓励民众建功立业。《礼记》记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创建国家领导民众),教学为先。”^[5]这表明早在国家政权创立之初,教育就已经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



皋陶

7. 成均之学

据《尚书》记载,舜帝继位之后,曾任命22名官员分掌政务。其中有两名官员兼有教育职责,一是司徒契,二是典乐夔。司徒契是黄帝的曾孙帝誉(kù)之子,即尧帝异母弟,也是后世商侯的先祖。舜帝对司徒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6]当时一般民众还没有姓,所谓“百姓不亲”,是指有身份的贵族不团结,所谓“五品不逊”,是指父母兄弟之间关系不够和顺,因此要求司徒契施行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准则的“五教”,特别强调要以宽和的方式施行教化。这是中国史籍将教育纳入政府官员职责的开端,也是倡导思想教育工作的发端。典乐夔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文教部长”。舜帝给典乐夔的任务是:“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7]意思就是要典乐夔用音乐教导贵族子弟,使之养成正直而温和的品格,宽大而谨慎的作风,刚毅而不粗暴的性情,简约而不傲慢的态度,以促成和谐相处的社会文明。舜帝倡导的这种以音乐传授文化,以音乐实施教化的模式,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影响很大。

中国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很深刻,认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8],将音乐视为天地和谐、阴阳调和的产物,也就是所谓“道”的产物。“道”就是自然规律,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9],只能“强为之谓之太一(姑且称之为太一)”^[10]。但是人一旦明白“太一”的基本道理,就可以“知一则明”^[11]，“能以一听政者(能够按太一的规律施行政务),乐君臣(君臣关系就可以融洽),和远近(远近四方就可以和平相处),说黔首(民众就会乐于支持),合宗亲(宗族亲情就会和谐)。能以一治其身者,

[1] 司马迁《史记》第49页。

[2] 同上。

[3] 李学勤《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4页。

[4] 同上书第1485页郑玄注。

[5]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6] 江灏《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7] 同上书第32—33页。

[8] 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尽享天年)。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教化兴盛)。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成)为圣人”^[1]，“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2]由此可见,中国古人的社会生活中,乐教与礼教都具有特殊意义,是教育民众、推行道义的重要途径。

西周时期,这种以音乐促进教化的教育模式,被称为“成均之法”。《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3]

郑玄解释:“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4]就是说,西周已将音乐列为教育贵族子弟(国子)的必修课。董仲舒甚至认为成均就是“五帝之学”^[5]。据专家研究,所谓“成均”,是古人开辟的广场,“这类广场在适于耕稼的农民部落地区较为普遍,在夏秋收获季节用于打场或堆积收获物,同时,也是全体氏族成员聚会、娱乐、举行某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或向氏族成员宣告氏族首领教令的场所”^[6]。殷商甲骨文的“学”字,最初并没有表示教室的“宀”,表示学生的“子”,这表明校舍和学生都是商代之后所形成,此前的“成均之学”只是在公共广场上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表现形式就是倡导和谐的音乐。1979年,陕西临潼发现的“姜寨文化遗址”,是一处6600年前古人聚居的村落,其“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7]，“广场总面积达4 000平方米左右”^[8]。1978年,陕西宝鸡发现的“北首岭文化遗址”,是一处7 000多年前古人聚居的村落,“村落的中心是一块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米左右的场地……这里当是公共活动场所”^[9]。由此可见,原始氏族公社的“成均之学”,确实是在公共广场开展的教育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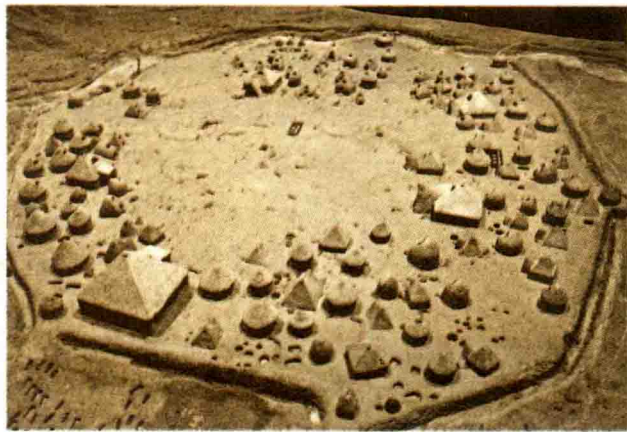
8. 学校的雏形——庠

据《尚书》所言,舜帝制订的“五刑”第2条,就是“扑作教刑”^[10]。孔颖达解释:“扑,撻(jǐǎ)楚也”^[11],就是用撻木制成的棍子,被列为当时专门惩罚学生的刑具,可见舜帝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活动已开始形成举世瞩目的社会事业。《礼记》记载:“有虞氏(舜帝)养国老(大夫以上退休者)于上庠(xiáng),养庶老(士以下退休者)于下庠。”^[12]郑玄解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13]由此可见,舜帝时代的“庠”已经从最初的托儿所、幼儿园,发展成为具有不同教育层次的专门机构,堪称是学校的雏形。

据专家研究,“庠”本是指饲养牛羊的棚屋,后兼作储粮的米廩。看守者大多是老人,于是派生

[1] 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2] 同上书第155页。
[3] 李学勤《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4] 同上。
[5] 同上。
[6] 李国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第40页。
[7] 《姜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8] 同上书第52页。
[9]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10] 李学勤《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1] 同上。
[12] 李学勤《礼记正义》第425页。
[13] 同上书第426页郑玄注。

出奉养老人的功能,同时兼有照顾小孩的作用,由此逐渐演变成为实施儿童教育的场所。舜帝时代是原始社会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代,原始社会素有尊老爱幼传统,视为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1]《诗经》记载:“九月肃霜(寒露结霜),十月涤场(打扫谷场)。朋酒斯飨(捧上两壶美酒),曰杀羔羊(宰杀一只羔羊),跻彼公堂(大家一起走进学堂),称彼兕



半坡遗址模型

(sì)觥(举起犀牛角杯),万寿无疆(祝老师万寿无疆)!”^[2]陈奂先生考证:“公堂,学校也。”^[3]可见“庠”作为氏族公社的公共教育场所,既是学校的雏形,也是最先享有“公堂”称谓之所。正如孙培青先生所言:“成均和庠都是原始社会末期开展多种活动的机构,包括当时的教育活动在内,它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学校,但它开始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为以后专门教育机构的产生奠定了基础。”^[4]

[1] 杨天宇《礼记译注》第265页。

[2]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7页。

[3] 陈奂《诗毛氏传疏》(商务印书馆)第79页。

[4]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10页。

